

## 《汉俄教学字典》的微观结构

郑述谱 张春新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本文提出供对外汉语教学使用的《汉俄教学词典》应尽可能地遵照汉语词典的蓝本对词典的微观结构要素——义项进行处理的观点, 着重介绍了《汉俄教学字典》对义项的处理方式。

**关键词:** 《汉俄教学字典》; 微观结构; 义项

**中图分类号:** H356

**文献标识码:** A

### 1 引言

词典的微观结构是词典的基本结构单位和功能单位, 是词典的主体。如果说词典的宏观结构好比一座建筑物的框架的话, 那么微观结构就是构成建筑物的一砖一石。宏观结构即总体设计好比经线, 微观结构即细部构造, 好比纬线, 经纬交织构成词典的总体架构。读者顺着经线竖读以查找自己所需的词目, 然后顺着纬线横读以了解自己所需要的信息。普通词典的词条都由两部分构成: 词目和释文。词目即独立立条的词或词素, 有些词典将固定词组、习语或短语也独立立条。释文即解释词目的文字部分。西方词典学中称词目为左项, 称释文为右项。左项是词典的叙述对象, 右项则是叙述的内容, 这与语言学中所谓的主位(谈话的题目)和述位(谈话的内容)具有类似的性质, 因此有的语言学家, 如前苏联的 Денисов П.Н. 干脆称左项为主语, 称右项为谓语。

黄建华通过对中外普通语文词典的对比分析, 将词典微观结构中提供的信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黄建华 2001: 67—68):

- 1) 拼法或写法。关于词形方面的信息。
- 2) 注音或标音。关于词的读音方面的信息。
- 3) 词性。关于词的语法属性方面的信息。许多语言学家认为, 这是语文词典条目中关键性的信息。
- 4) 词源。关于词的来源和词的出现年代的信息。
- 5) 释义及义项编排。关于词义方面的信息。一般认为, 这是微观结构的核心部分。
- 6) 词例(包括自撰例和引例)。这是关于词在具体语境中的用法的信息。
- 7) 特殊义。关于词在特定学科中的含义的信息。
- 8) 百科方面的信息。
- 9) 词组、成语、熟语、谚语等。这是关于词的构词能力的信息。这类词语, 一般都有自己独立的用法和含义, 有些词典干脆将其列为词目, 亦即不放在微观结构之中。
- 10) 同义词、反义词、近义词、类义词、派生词等。这是关于词目词与其他词的联系方面的信息。

以上 10 项信息是从大量语文词典中综合归纳出来的，一般的语文词典不会如此完整地包括所有这些方面。例如，现代语的词典不一定提供词源方面的信息。而某些特种语文词典例如语音词典、正语法词典、同义词词典等等则只提供一、两项信息。要提供哪一方面的信息，是由词典的性质和规模决定的，编者的主观取舍也起很大的作用。

## 2 《汉俄教学字典》的微观结构要素——义项

### 2.1 《汉俄教学字典》对义项划分的依据

《汉俄教学字典》是一部共时性的供对外汉语教学初、中级阶段使用的词典，因此，本词典不提供词源方面的信息。百科信息、特殊义等也都排除在外。其他几个方面的信息在本词典中都有所反映。例如拼写法方面，提供条目字按笔画分写的书写顺序示意图，以便学生掌握汉字的形体、构成、部件、笔画及书写特点。标音方面，考虑到初学汉语的学生认识的汉字有限，为了使词典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工具书，不给学生认读汉字增加负担，无论条目字、还是字义下的词例、词组、句子一律标注汉语拼音。其实，这样的做法在最近几年出版的对外汉语教学词典中已经作了一些尝试。除了这些做法之外，《汉俄教学字典》的词条微观结构还有其他一些特有的编排方式。本文主要介绍《汉俄教学字典》对微观结构的要素——义项的处理方式。

当编纂者为一部词典选定词目后，紧接着就要着手为这些词目确立、分合、排列义项，这是词典的首要工序。《汉俄教学字典》的条目单位是字，处理条目字的义项自然是释义工作的第一步，而且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汉俄教学字典》是一部双语词典，要涉及到两套不同的语言符号，由于不同民族思维方式、认知、文化背景等等方面的差异，两种语言对同一个概念的划分也存在着较大的分歧，这种分歧在词典中表现为两种语言的对应词在义项划分上的差异，对这个问题，作者曾经专门著文探讨（郑述谱 1993：1-7），并得出结论：外语词典的义项划分比汉语词典要细。那么，同时涉及两种语言的双语词典，在处理义项的概括和划分问题的时候，应该以哪一种语言为基准呢？黄建华认为：“双语词典的义项划分是可以而且也应该和单语词典不尽相同的。关键是编者要善于安排，既要不漏地解释词目的含义，又要使译语的读者易于接受”（黄建华 2001：136）。陈楚祥也认为，双语词典中义项的划分原则上同单语词典，除了以选定的蓝本为基础并参考其他原版词典作必要的分合以外，还应根据不同语言词汇的语义内涵的异同和读者在理解和运用上的困难作必要的调整。如汉语的“搞”这个词在《现代汉语词典》里只有一个义项：做；干；办；弄。而在《汉英词典》里却分为五个义项。又如俄语词 *вопрос*<sup>①</sup>“要求回答或解释的题目”，<sup>②</sup>“需要研究解决的矛盾、疑难”，这两个意义都相当于汉语的“问题”（陈楚祥 1994：151）。

对于一般的双语词典来说，这种原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对于以教会外国人掌握汉语的词汇、语义系统为主要目的《汉俄教学字典》来说，这种做法就有一点偏离了字典编纂的宗旨。为了准确描写由不同义项所构成的每个字的语义网络，我们认为，《汉俄教学字典》应当严格保持汉语的词汇和语义系统，在对义项的处理方面还是应当尽可能地遵照汉语单语词典的蓝本。

### 2.2 一般汉语词典对义项的划分

义项，作为词典学术语，它是受语义学和词典学双重制约的：一方面，它要符合语义学对于词义的限定；另一方面，它又得符合词典编纂的特殊要求。所谓“一个词进入语言是一回事，而进入词典完全是另一回事”，说的正是义项的这一特点。义项的许多属性、特征，其实也都是由它的这种双重制约性决定的。

语义学中，词义的最小单位是义素（*семема*）。义素指的是用于某一个意义上的词，即 Смирницкий А. И. 所说的“词汇语义变体”（ЛСВ）的内容层面。按理说，从理论上讲，语义学中的一个义素即相当于语文词典中的一个义项。英国著名语言学家 Randolph Quirk

在《朗文当代英语词典》(1995)“序言”中指出：“语义分析是释义的核心，词典编纂者的思维要像外科大夫的手术刀那样锐利，把当代用法中出现的每一个主要义项切分开来。”(转引自钱厚生 2001: 81)。然而，词的各个意义之间往往并没有一个界限分明的分水岭。这正如同光谱一样，相邻的两种颜色并不是截然分开、泾渭分明的。Щербань Л. В. 承认：“困难还不仅在于给词的意义作解释，最大、最主要的困难在于不容易确定一个词的各个意义……。”他进而指出：“要确定一个词的几组基本意义还不太难，而要确定词义的细微差别却十分困难”(谢尔巴 Л. В. 1981: 23)。

鉴于这种复杂的情况，有的学者提出了词汇学范畴在词典中的相对性问题。所谓“相对性”是指词典编者对词义所作的不同概括，例如汉语“火”字在《中华大字典》里有 19 个义项，在《辞海》里有 9 个义项，在《现代汉语词典》里为 8 个义项，在《新华字典》里为 7 个义项。怎样看待这种义项不等的现象呢？还是应当从词典的实际出发。词典的义项概括，是在语言材料（主要是书证）基础上进行的一种再概括。反映客观对象的概念本身，便有属概念与种概念的层级关系，作为概念外壳的词，自然也有这种关系。这就为词典编纂者提供了对义项在不同层级作不同程度概括的客观可能性。再从词典性质角度看，为了适应不同读者的不同需要，性质、规模不同的词典除了对义项可作不同取舍外，还可以作不同程度的同类归并。因为一个词的许多义项之间，除了有互异义素相区别外，往往还有一个或数个共同义素相联系。据其异可以分到最小语义单位；而据其同又可将一些最小语义单位进行归并。

西班牙词典学家卡萨列斯认为：“意义的或多或少，既决定于具体的词，也决定于词典编者的主观看法”(转引自陈楚祥 1994: 151)。在实践中，语文词典编纂中义项的设立有相当大的灵活性。目前，汉语语文词典编纂中，义项分合的处理，主要是由所编词典的规模、功用和性质的决定的。

从词典的规模、功用上分析，一般是：

大型语文词（字）典以语文专业工作者为主要服务对象，故应以义素为义项，尽可能对词语的义素、义系作客观的反映；中小型语文词（字）典主要供各级各类学校的学生和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人使用，故应力求简明扼要，以简驭繁，舍弃部分使用频率较低的生僻义，合并相邻、相近的义素，因而这类词典的义项有时与义素相当，有时则大于义素。有的中小型语文词典，为了既尽可能全面地概括词义，又做到节省篇幅，释义简明，还往往把相近的义素合并为“义项组”或“义项目”(符淮青 1995: 76)。

### 2.3 《汉俄教学字典》对义项的处理

《汉俄教学字典》同时以几部汉语词典作为蓝本，由于这几部蓝本词典对义项的归纳与划分并不完全统一，我们在借鉴蓝本划分方法的同时，也作了相应的调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删除冷僻、不常用义项

《汉俄教学字典》从规模上来看，属于中小型词典，从性质上看，属于面向外国人的积极型教学词典，因此，义项的收录不必像描写性的大型汉语词典那样全面，义项的划分也不必那样细致，只要收录现代汉语中常用的义项就可以了。而且，即使是现代汉语常用的义项，也不是全部都必须收入进来，因为对于初、中级阶段的外国学生来说，只要掌握一个字的最常用的义项就已经足够了。但是，究竟哪些义项称得上是最常用的呢？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汉语水平考试中心编纂的《汉语 8000 词词典》为我们提供了决定义项的取舍的依据。这部词典是根据《中国汉语水平考试词汇大纲》编写的，收入的词和义项都是外国学生参加汉语水平考试必须所掌握的，并且，这部词典中还将多义字、词的义项按其常用度分为甲、乙、丙、丁四级。我们的《汉俄教学字典》主要在这部词典的范围内对义项进行选取。例如“炒”，“《现汉》列了 3 个义项，①烹调方法，把食物放在锅里加热并随时翻动使熟；②指倒买倒

卖；③〈方〉指解雇。这三个义项只有第一个义项在《汉语 8000 词词典》范围之内，因此，我们保留这个义项，而去掉后两个义项。同时，对于《汉语 8000 词词典》之中收录的义项，我们尽量选择甲、乙两级的义项，对于丙、丁两级的义项则酌情选收。例如，去掉“洗”的丁级义项“玩牌时把牌摊和整理，以便继续玩”和“厚”的丁级义项“优待；推崇；重视”。

2) 根据语法功能的差别，对义项进行适当拆分。

词的语法功能是指词的组合能力和充当句法成分的能力。大部分汉语词典在划分义项的时候，仅仅从意义的角度出发，因而往往将意义比较接近而语法功能迥异的义项合并在一个义项之中。如：

例 1) 当(dāng) 《新华字典》：……③正在那时候或那地方：～学习的时候，不要做别的事情 | ～街 | ～院 | ～中 | ～面(面对面) | ～初……。《现汉》：……③面对着：～面 | ～着大家谈一谈 | 首～其冲 ④正在(那时候、那地方)：～今 | ～场

如果从语法功能的角度看，这两部词典的上述义项都显得有些含混，释义既可以理解为动词，又可以理解为介词，而例证中既有动词性用法，又有介词用法。当然，这里涉及的动词与介词的界限问题至今仍然是语法研究上的一个难点，不能以此来苛求几十年前编写的词典。如今要把语法功能引入语文类工具书，就不能回避这个问题。目前大家公认的区别动词与介词的标准是，动词可以充当谓语，而介词只能跟它的宾语一起修饰谓语。用这个标准可以解决绝大部分问题。“当”也可以据此把两种属性的用法划分开：

① [动] 面对着：他们家正～着大街 | 首～其冲 ② [动] 在，正在：这几天种棉花正～时 | 大难～头 | 一事～前 ③ [介] 引进事件发生的时间或处所(也说“当着”)：每～春暖花开的时候，人们都愿意去郊外走走 | ～着大家的面，把事情讲清楚 | ～场表演 | ～面点清。

例 2) 成 《新华字典》：……② 事物生长、发展到一定的形态或状况：～虫 | ～人 | 五谷～熟

这个义项下的 3 个例证可以归并为两类，前两个是形容词性，而后一个则是动词性。据此，可以将这个义项拆分为两个：

① [动] 发育到完备的阶段：～长 | ～熟；② [形] 发育成熟的：～人

3) 对字<sup>1</sup>的每个义项标注词性或语法属性

上面我们所说的根据语法功能对字的义项进行切分，实际上就是区分字义的语法属性的过程，也就是对语素进行词性标注的过程。对比汉语词典和外语词典，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汉语词典提供的语法信息特别少。以往的汉语语文词典中主要包括了字形、字音、释义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对词性的标注则做得很不够。大多数汉语词典没有标注词性，有些词典只标注虚词的词性，如《汉语大词典》。汉语词典在语法信息标示上的不足，与国外的词典编纂相比，不能不说存在着一个较大的差距。这主要是由于汉语语法学产生得比西方晚得多，语法学进入中国后的一段时期中，人们对汉语词类问题的认识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所以要想在一部词典中为汉语的词作彻底的分类，给每一个词都标上词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汉语词典可以不标词性或者说标不标都无所谓，恰恰相反，从道理上说，汉语语文词典完全应该标注词性。第一，词的内涵包括词的意义和语法功能两个方面。仅仅解释词义只解决了一个方面的问题，虽然是重要的，但不全面。因为，要真正掌握一个语言系统中的词汇，不仅要理解其词汇意义，更重要的是了解其用法。而要了解其用法，就不能不了解其语法方面的表现与特性。不了解词的语法特性，对词的掌握就是不全面的。因此，标注词性，概括地揭示词的语法功能，能够与词的释义一起构成较为完整的信息。对实词的词性标注可以看作是在释义前后对词语进行的语法规律性的注释。按照语法规律，凡名词一般皆可用作主语和宾语，动词皆可作谓语，形容词可作谓语和定语，等等。标注词性等高于效率地告诉读者这种一般用法的可能性，这种知识与词典的释义和例证相配合，就使读

者得以更深入更精确地理解词语的意义。而对于虚词来说，词性标注更是释义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这从许多词典（如《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等）将对词性的说明直接纳入释义文字的正文之中就可以体现出来，例如“在：介词，表示时间、处所、范围等”。这样的词性标注实际上成为了广义释义中重要的部分，对于读者尤其是学习汉语的非汉族人来说，是非常方便实用的。第二，标注词性还能够提高词典效率。由于读者可以根据词性标注将所要查找的词义迅速缩小到多义词词的一少部分义项之中，将不属于自己需要查找范围内的许多义项迅速排除在外，假如所要查找的词义属动词性，该词目义项中所有非动词义项只需要看一眼词性标注就都可排除。这就不需要将所有义项都一一读遍，稍有语法知识的读者因而也就得以缩小查找范围，节约宝贵的查找时间。这样做占用篇幅不多，效率却很高。第三，标注词性能够使词典编者自觉地从词的语法功能的角度考虑义项的确立和分合，检验释义的准确性及释义与例句的协调等等，有利于进一步提高词典编写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近些年来出版的汉语词典已经在词性标注方面作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例如李行健主编的《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语文出版社 1998）。对外汉语学习词典标注词性始于 80 年代。1982 年，北京语言学院编纂出版了供外国人学习汉语使用的双语词典《简明汉英词典》，首次在对外汉语学习词典中标注了词性。以后相继出版的《现代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北京语言学院）、《汉语水平词汇等级大纲》（国家汉办）、《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现代汉语学习词典》（北京语言学院）、《HSK 汉语水平考试词典》（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等多部对外汉语教学词典都在词性标注等方面做了新的有益的尝试。

鉴于标注词性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我们的《汉俄教学字典》决定随义项标注词性，以便帮助第二语言学习者从理解词的语法特点的角度掌握词的用法，这也是提高本词典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使用效率的一个重要举措。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词性标注然而在这方面也有一些难于解决的问题，比如词和语素的区分以及语素如何标注的问题。这是一个汉语特有现象，在本词典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编写词典的字头部分，其实主要面对的就是语素。吕叔湘先生对错综复杂的汉语语素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得出结论：“总起来说，语素可以分成四种。（1）能单用的，单用的时候是词，不单用的时候是构词成分。（2）一般不单用，在特殊条件下单用的，单用的时候是词。（3）不单用，但活动能力较强，结合面较宽，有单向性，即只位于别的语素之前，或别的语素之后，或两个语素之间。这是所谓‘前缀’，‘后缀’，‘中缀’，可以总的称为‘词缀’或‘语缀’。（4）不单用，结合面较窄，但不限于在前或在后，专作构词成分，可以称为‘词根’”（吕叔湘 1979：19）。也就是说，单个的字（单音节语素）有的仍然是可以单用的词，有的已变成只能构词的语素，有的既可以单独成词，又可以作构词成分，这种语素在字典或词典的字头部分里占绝大多数。对于这种情况，大多数人都严格地主张，要标注词性就只能标注在那些能够单独成词的语素上，不能独立成词的语素绝对不应该标注词性。从理论上讲，根据词的语法功能给可以单用的词标注词性而不用管只能构词的语素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是汉字中多数是或词或语素的东西，对它们该怎样标注词性呢？而且要想把汉语的词和语素截然划分开是非常不易的。赵大明提出的处理办法很值得我们借鉴，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如采取这样一种办法，给每个语素的各个义项都标出语法属性，能够单用的语素上所标的就是词性，不能单用的语素上所标的是语素的属性（其实主要是名、动、形三类）。对于那些不论是全部义项都可以单用还是部分义项可以单用，或者是在某种特殊情况下才可以单用的语素，都可以根据其单用时的语法功能确定其词性，对于那些不能单用的语素（语缀除外）可以结合它的意义和古汉语中的用法给它确定一个语法属性”（赵大明 1999：14—15）。例如：

包（bāo） ① [动] 裹起来：用纸把糖～起来 | 用纱布把伤口～好。

包装

② [名] 裹起来的東西：这个～太大了，箱子里放不下。 | ～太重，路上不好拿。

包袱 包裹

邮包

③ [名] 装东西的口袋：请你把书装进~里。

背包 书包 提包

④ [量] 用于成包的东西：医生给他开了三~药。

⑤ [动] 容纳；总括

包含 包括

.....

这个例子包含了上面提到的语素的所有存在形式，前 3 个义项上语素“包”既是独立成词语素，也是不单用的构词语素，在义项④上则是独立的语素，在义项⑤上则只是构词语素。不论属于哪种语素，我们都可以根据上面提到的原则对义项进行词性或语法属性的标注。

顺便提一句，本着以字为中心的原则，我们进行词性标注的只是条目字的各个义项，对合成词则不作词性标注，而且不对其进行汉语释义。

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由于我们对不能单用的构词语素所标注的词性是根据其在合成词中的意义来判定的，因此，语素的语法属性并不能表明其下所统领的合成词的词性，例如，“司：掌管、主持”这个义项之中，语素“司”是动词性的，但是该义项下的合成词“司令”、“司机”、“司仪”等却都是名词。

标注词性是科学性原则的需要，也是实用性原则的需要，对外汉语教学多年的实践，已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由于汉语词类的复杂性以及学术界对划分词类的意见分歧很大，标注词性一直被人们视为畏途。目前明确注明词性的词典并不多，而且各家意见时有相左，我们在确定义项词性的时候主要以 HSK《词汇大纲》为依据，同时参照《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规范字典》，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尽管我们在本词典的编写过程中，对词性问题谨慎地进行了反复斟酌和研究，但由于词性问题确实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因此难免仍存在许多欠妥之处，有待于今后进一步加以修正和完善。

#### 4) 义项的排列顺序

现代最流行的汉语字典和词典对古代词典在义项排列方面最为突出的改进，就是将原本杂乱无序的义项排列得有序。古代的词典是不怎么考虑效率的，例如《尔雅》对于词条所分的庞大类别，如果没有后人编纂的索引，使用者从中查找条目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直到《康熙字典》，我们的先人还是将义项杂乱无章地摆在一起，几乎没有意识到对于义项的处理需要考虑效率。现代词典将义项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是注重词典效率的一个具体体现。除了效率的考虑，在今天看来，建立有序的义项排列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意义是，能够揭示词义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帮助读者理解词义。

很多人强调，双语词典的义项排列最好是按照频率的原则，即按通用、少用、罕用的常用程度排列义项。这种排列原则的优点是从实用的角度出发，使读者根据排列顺序知道该词义的常用程度，同时也便于查找，因此受到一般读者的欢迎。例如《简明牛津词典》就是完全按使用频率原则排列义项的。然而，这种排列原则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对各义项间内在语义联系的揭示，而语言学习过程中词汇义项的认知进程有时又是同单词义项的演进过程相吻合的，即由本义到引申义和比喻义。词典用于查找义项来帮助理解时，词频排序有优势，但学习者若想利用词典全面掌握某一单词，则语义联系排序更见其所长。

词的语义联系是通过词义的引申规律表现出来的。有人说，词义引申的规律是打开词义大门的一把万能钥匙，它可以让使用者在理解词义的联系时化难为易，化乱为明。陆宗达和王宁在《古汉语词义研究》中就曾指出：“引申是一种有规律的词义运动。词义从一点（本义）出发，沿着它的特点所决定的方向，按照各民族的习惯，不断产生新义或派生新词，从

而构成有系统的义列，这就是词义的基本表现。”由于人类思维规律的共性，在各种不同的语言中，引申词义的途径有许多共同之处，比如“桌腿——ножка стола”，“瓶颈——горло бутылки”，“帽耳朵——ушка шапки”，“椅背——спинка стула”等词，在汉、俄语中都是表人体器官的词转指事物的部分，从而产生词义的引申。根据两种语言中词义引申规律的共性，不难推断出，在教外国学生学习一个多义字的时候，如果能够从本义出发，并按一定引申规律将派生出来的其他意义依次给出，那么，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就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这种学习字义的方式比那种机械的地记忆各个毫无联系的义项的方式更容易。

因此，在《汉俄教学字典》中，我们按照词义引申顺序排列义项。这种排列法的优点是条分缕析，源流分明。读者可以从词义的排列次序中窥见各个义项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样，读者可以看到各义项的组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可以提纲挈领，以简驭繁地掌握词义，同时也使义项的建立和注释有了更可靠的依据。

### 3 结束语

以上我们介绍了《汉俄教学字典》对词典微观结构的要素——义项的处理办法。我们认为，这种特殊的处理方式能够较大幅度地满足学习汉语的外国学生的需求，提高其学习效率，是对外汉语教学工具书编纂理念上的一个崭新的尝试与突破。

#### 附注

1 这里所说的“字”指的是“成词语素”和“不成词语素”，不包括无意义的纯粹的“音节字”。《汉俄学字典》对纯粹的“音节字”不标注词性。

#### 参考文献

- [1]陈楚祥 1994 双语词典的微观结构 [J], 辞书研究, 第 5 期。
- [2]符淮青 1995 词义单位的划分和义项 [J], 辞书研究, 第 1 期。
- [3]黄建华 2001 词典论 (修订版) [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 [4]吕叔湘 1979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5]钱厚生 2001 语义分析与双语词典 [J], 辞书研究, 第 3 期。
- [6]谢尔巴 Л.В. 1981 词典编纂学一般理论初探 [A] // 词典学论文选译 [C] 石肆壬主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7]赵大明 1999 汉语语文词典标注词性的难点 [J], 辞书研究, 第 1 期。
- [8]郑述谱 1993 汉语与外语词典义项划分之比较 [J], 辞书研究, 第 3 期。

## The Microstructure of the Chinese-Russian Teaching Dictionary

ZHENG Shu-pu, ZHANG Chun-xin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Explanation of the word meaning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s of the microstructure of dictionaries.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definitions of the word meanings in Chinese-Russian Teaching Dictionary, which is compiled specially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should be arranged

according to Chinese dictionaries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introduces the way of the treatment for terms in this dictionary.

**Key words:** Chinese-Russian teaching dictionary; microstructure; explanation of word meaning

**收稿日期:** 2007-01-05

**基金项目:**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项目《教学词典学专题研究》(项目编号: 05B009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郑述谱(1940-)男,山东牟平人,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词汇学、词典学、术语学;张春新(1975-)女,黑龙江省宾县人,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词典学、术语学。

**[责任编辑: 彭玉海]**